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编

玄奘与谭云山

东方文明的气质与中印研究的灵魂

印度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

印巴核问题与对地区及世界安全的影响

老挝与美国的关系

从金融危机看阿拉伯石油美国的流动与中阿经贸合作的新思路

东方民族主义及其特点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分析

索马里海盗问题的根源与对策探析

巴金与马哈福兹小说艺术的比较

印度诗学的中国接受

泰族起源与建国史的纷争

20世纪以来非洲文学的若干特点

印度教的神灵及其特点

甘地宗教及其影响

斯里兰卡民族问题之历史沿革

泰国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背景

亚非研究

第3辑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印度文明对马来文化的作用及影响

中国学研究学者陈泰夏访谈

老挝的中国学研究及汉语教育

李东乡教授访谈录

郁达夫——李孝石的异国情调特点之研究

试析日本对非政策及其特点

时事出版社

710

亚非研究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第三辑)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编

时事出版社

D50/-53
B631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亚非研究 (第三辑) /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编. —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80232-301-8

I. 亚… II. 北… III. ①亚洲—研究—丛刊②亚洲—研究—丛刊
IV. D73-55 D7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1318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shishe.com

印 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7.25 字数: 575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
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亚非研究》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季羨林 饶忠颐 耿世民 黄心川 郝平

主 编: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院长

副 主 编: 白 滔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一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王一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高等教育和远程教育
专家

王邦维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冯玉培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叶奕良 北京大学教授

宁 骚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石源华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

刘 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文化研究室主任

刘曙雄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孙宝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江勤政 前驻斯里兰卡大使

余太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余定邦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朝意 北京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处长

李 岩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李安山 北京大学教授, 北大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金明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教授, 博士
生导师

- 李保平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非洲史研究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 李晨阳 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 杨保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
- 邱苏伦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 陆蕴联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 苗春梅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 郁龙余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
-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金京善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 姜永仁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
- 拱玉书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贺文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 贺圣达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 赵月珍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 秦赛南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 顾章义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
- 曹云华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 梁志明 北京大学东南亚及越南问题专家
- 梁敏和 北京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理事

目 录

纪念谭云山、师觉月诞辰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专栏

- 东方文明的气质与中印研究的灵魂 谭 中 (3)
- 纪念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创立者——谭云山先生 董友忱 (11)
- 我与甘地先生的第一次会见 谭云山著 董友忱译 (21)
- 对吠檀多不二论与印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再认识 吴永年 (29)
- 玄奘与谭云山 毛世昌 (43)
- 印度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 尹锡南 (63)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和为贵”传统文化与中国—印度尼西亚

- 战略伙伴关系 梁立基 (79)
- 老挝与美国的关系 张良民 (96)
- 印巴核问题及对地区和世界安全的影响 赵伯乐 (105)
- 土耳其主要政党的现状分析 彭 俊 沈志兴 (115)
- 简论东方现代民族主义及其特点 黎跃进 (125)
- “黑扎布”热现象的解读 王保华 (135)
- 试析日本对非政策及其特点
- 兼谈第四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潘华琼 (149)
-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分析 佟加蒙 (165)

WTO 与沙特政府管理	刘欣路 (174)
索马里海盗问题的根源与对策探析	杨廷智 (183)

语言文学研究

印度诗学的中国接受	郁龙余 (197)
斯瓦希里语戏剧创作的兴起与发展	冯玉培 (211)
“打开手铐, 除去脚镣” ——《古地亚圆筒铭文》中反映的和谐、公正社会	拱玉书 (222)
巴金与马哈福兹小说艺术的比较 ——以《激流三部曲》与《官间街三部曲》为例	薛庆国 (240)
一段尘封历史的再现 ——《白士穆雷人》对阿拉伯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徒 关系的重新解读	尤 梅 (251)
郁达夫—李孝石的异国情调特点之研究	金京善 (263)
朝鲜后期三湖亭诗社形成原因考察	李丽秋 (277)
高敬命诗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借鉴	石云涛 (289)
汉字对创制韩国文字(训民正音)的影响关系	[韩国] 李英月 (302)
元小说《黑书》	[土耳其] 贝尔纳·摩兰著 李智育译 (310)
一位为全人类歌唱的诗人 ——谈乌斯曼·阿旺及其诗作	苏莹莹 (321)
20 世纪以来非洲文学的若干特点	夏 艳 (337)
斯瓦希里语口头文学——谜语	魏媛媛 (350)
斯里兰卡三大传统戏剧之科兰假面戏剧	马仲武 (360)

历史和社会研究

俾斯麦海外殖民中的非洲因素	陈从阳 (373)
泰族起源与建国史的纷争	邱苏伦 (384)
印度中世纪耆那教诗人自在主	薛克翘 (396)
印度教的神灵及其特点	朱明忠 (407)

甘地宗教观的独特性及其影响	李亚兰 (422)
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圣经考古学的历史和方法框架	陈贻绎 (435)
斯里兰卡民族问题之历史沿革	江勤政 (457)
老挝的中国学研究及汉语教育	陆蕴联 (471)
文化外交视角下国际高等教育交流的几点思考 ...	顾小存 杨晓京 (486)
泰国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背景	陈 利 (500)
印度文明对马来文化的作用及影响 [马来西亚] 侯赛因·亚哈亚著 苏莹莹译	(509)
欣欣向荣的马来西亚私立教育	邵 颖 (516)

韩国汉学访谈录专栏

中国学研究者陈泰夏访谈录	王光明译 (533)
李东乡教授访谈录	[韩国] 宋贞秀 任 翔 郭露璐译 (552)
柳世熙教授访谈 采访人: 金永京 编审: 金都姬 周晓蕾 汪波译	(571)

纪念谭云山、师觉月诞辰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专栏

“纪念谭云山、师觉月诞辰 110 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专栏编者按

2008 年是中国谭云山和印度师觉月两位学者诞辰 110 周年。为了纪念这两位对中印文化交流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前辈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和海外汉学中心协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大学和深圳大学等多家单位，共同举办了“纪念谭云山、师觉月诞辰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和国内多所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共 7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且在会议期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所有与会专家学者都达成高度共识，即需要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谭云山和师觉月终身致力于中印友好交流的精神，继续从学术层面推动中国和印度之间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本次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提交了很多见解精辟、论述高妙的论文。本书特别从其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几篇论文，希望引起同仁更为广泛的讨论和研究。

东方文明的气质与中印研究的灵魂

谭 中

“中印两国同立于亚洲大陆，天造地设，成为邻国。从人类全部历史来看，人类总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而中印各居其一，可以说是占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半，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实。”^①

这番话是中国的国学大师兼印度学大师季羨林教授说的。这番话提醒我们三点：（1）中印相邻并非偶然，而是“天造地设”，超越了普通的地理规律；（2）中国和印度不是平常的国家，而是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体系”；（3）从“人类文化宝库”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的体积与含金量约占世界的一半，不能等闲视之。这样的评价是很新鲜的，很多当代学者（包括中印两国学者）、尤其是那些深受西方现代文明熏陶的人，是不会同意的。

季羨林有一个著名理论，他说：“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 21 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②

我和季老相识整整三十年了，对他所有的观点基本上持欣赏与敬佩的态度——包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认为他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从狭隘的“大东方主义”出发去搞“文明冲突”，向西方逞强，去夺取

① 季羨林：《中印文化交流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 页。

② 季羨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 页。

西方文明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而是反馈西方文明用强霸手段把它的优越感强加于东方的知识分子头上。我认为季老是故意“矫枉过正”去灭西方文明的威风，长东方文明的志气，这样做也等于弘扬正义，遏阻中国“崇洋媚外”、捡起西方的鸡毛当令箭的不正之风。^①

从整体观念来看，本不应该把文明分割成“东”、“西”两半的，但这种分割是西方文明强加于我们的。^② 印度“诗圣”泰戈尔是诺贝尔文学奖（1913年）第一位非白种、非西方的获得者，他既属于东方文明的一部分，也属于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他既崇拜西方文明，又看到西方文明的严重缺点。1924年泰戈尔在中国的讲演中说：“在别的（西方）国家有堆积如山的财富，生活好像是在古埃及国王的坟墓之中。那些财富凶恶地嚷道：‘滚开’。当我在你们国家（中国）发现日常物资的魅力时并不感到它们在驱逐，而是听到它们的邀请：‘来吧，请接受我们’。”^③

泰戈尔十分羡慕中国人既重视物质文明（不像印度人那样偏重精神文明），又不像西方物质主义那么贪婪。他甚至说，“东方和西方的伟大文明”被“我们现代那种超前的小学生们碾死了”。他说的“小学生们”指的是西方的统治精英，说他们“都是些自作聪明的、吹毛求疵的自我崇拜者，利润和权力市场上的狡猾讨价还价者……他们本来想用金钱收买人们的灵魂，吸干了以后再把它丢进垃圾堆里去。可是到了最后，他们那情欲的自杀力量在邻居的房屋上放起火来，终于把自己置于焰海之中。”^④

泰戈尔说：“西方已经变成剥削者，已经尝到剥削的果实而丧失道德，我们却必须用人类道德和精神力量的信心来战斗。”他又说：“我们东方人既不能借来西方的头脑，也不能借来西方的脾气。我们要去发现我们自己生下来应该有的权利。”^⑤ 1941年泰翁临终前写了《文明的危机》（Crisis

① 2008年9月我参加上海第三届“中国学”国际论坛就曾针对国内特别时兴的“软实力”理论进行批评，认为这是捡起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软权力”（soft power）理论，把一种为美国失去世界霸权而想亡羊补牢的观念用来指导中国文化的发展的严重错误。

② 最明显的例子是：英国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名言：“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东方和西方永不相遇”，是他1895年写的《东方与西方民谣》（*The Ballad of East and West*）的开场白。

③ 参见 Sisir Kumar Das (ed), *Rabindranath Tagore's Talks in China* (1999, Calcutta: Rabindra-Bhavana, Visva-Bharati), p. 65.

④ Ibid., p. 94.

⑤ Ibid., p. 53.

in Civilization) 一文, 结尾是: “我环顾四面八方, 看见一个骄傲的 (西方) 文明倒塌, 变成一大堆枉费心机的垃圾”, 又说: “可能从这地平线上、从太阳升起的东方, 黎明将会来到。”^①

听了泰戈尔这些话, 我们一方面可以把季羨林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成和印度知识精英的共鸣, 另一方面, 又看到一贯温和、亲西方的印度先哲泰戈尔对现代西方文明横蛮统治全球、排斥“非西方”智慧的憎恨, 这种憎恨要比季羨林强烈得多。今天我们趁纪念谭云山和师觉月诞辰 110 周年来推动中印研究是不能也不应跳过泰戈尔和季羨林的深刻感受而去另起炉灶的。他们的金玉之言, 都应该作为我们的指南。

我在本文中根据这一精神, 不是盲目地排斥西方文明, 而是用西方文明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重新认识东方文明的伟大智慧。现在我们研究中国和印度是脱离不开国际研究的范畴的。当今在国际研究中时兴“现实主义”, 把西方文明中的物质主义、“我”字当头与斤斤计较看成重中之重, 使得理想主义靠边站, 冤枉地背上“脱离现实”的罪名。我们一定要为理想主义讨还公道, 像泰戈尔所指出的那样, 不做“吹毛求疵的自我崇拜者, 利润和权力市场上的狡猾讨价还价者”, 像季羨林所指出的那样, 把“占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半”的中印两国文明的智慧发掘出来、发扬光大。

中印两国文明的智慧很难深入浅出地总结出来, 笼统地说, 东方文明的气质包括三大内容: (1) 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大同”思想, 演绎出中国的“天下为公”与印度的“*vasudhaiva kutumbakam*/天下一家”; (2) 中国的“天人合一”与印度的“*Brahmatmaikya*/梵我一体”相互辉映, 从中发展出中国的“和谐”以及印度的“*santi*/和平”与“*ksanti*/容忍”的美德; (3) 提倡精神高尚的“清流”, 贬抑物质贪婪的“浊流”。现在简短地谈谈这三点:

第一, 中国文化对人类智慧的一大重要贡献是“大同”概念, 这是一个无法翻译成外国语言的思想符号。阐述这一光辉概念的著名文献是《礼记·礼运·大同篇》, 开宗明义地道出“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我们把这句话移植到现代生活中来, 意思就是: “如果全世界都被真理照耀的话, 公共的利益就应该成为大家的普遍关注与行动指南。”

^① 参见 Sisirkumar Ghose (ed), *Tagore for you* (1966, Calcutta: Visva-Bharati), pp. 188-189.

我们还没有看到印度学者对印度传统观念“*vasudhaiva kutumbakam*/天下一家”的详细诠释，泰戈尔曾在著作中流露过这一思想。他说：“在印度历史上有客人不远千里而来，那时这个国家（印度）和世界联通。但是那间客舍早已关闭，基础垮掉。我们必须从母亲的仓库中找出所有的物资来把它重建。”^①他又说：“在现代世界，地理的边界已经丧失意义。世界不同民族更为接近。我们必须认识这点，同时懂得这种接近应该建筑在爱心之上。”^②泰戈尔的这些话都折射出印度传统“天下一家”的思想，我以后还要回到这一点上来。

第二，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两千多年前庄子明确提出来的。他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和印度的传统观念“*Brahmatmaikya*/梵我一体”相共鸣。季羨林对这一共鸣的解释是：“印度与中国都把宇宙（自然）当做自己的亲密朋友。人类和大自然互相热爱、互相友好，和睦共处。”^③

从中国“天人合一”和印度“梵我一体”的共鸣中，出现了中国的“和谐”以及印度的“*santi*/和平”与“*ksanti*/容忍”的美德。中国古代哲学以一个“仁”字为核心。“仁”字笔画符号画出社会轮廓，指出社会两大要素是“二人”——“己”（自己）和“人”（别人），有“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规律。这是结构性地确定社会“和谐”的基本道德。

印度人几千年来叫喊得最多、最响的音符是“*shanti*/和平”（梵文作 *santi*），汉译为“寂”，由佛教传到中国，在中国文学中增加了“寂定”、“寂寞”、“圆寂”、“禅寂”、“寂灭”等新的概念。印度“*ksanti*/容忍”的诉求最为突出，印度文明可称“忍”的超级文明，佛陀也叫“忍仙”或者“忍辱仙”。印度“忍”的诉求对中国精神修养贡献很大。许慎《说文解字》上的两个“忍”字，上部从“刀”的是“怒”的意思，从“刃”的是“能”的意思。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

① Uma Das Gupta, *Rabindranath Tagore: My Life in My Words* (2006, New Delhi: Penguin/Viking), p. 197.

② Ibid., p. 199.

③ 参见谭中与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页，季羨林“序”。

公》与佛经的“忍不可忍者，万福之源”（《六度集经》3章）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第三，中印两大文明都提倡精神高尚的“清流”，贬抑物质贪婪的“浊流”。中国的“真善美”概念来自印度，是印度一种理想境界“satyam、shivam、sundaram”的意译：“satyam”是真理，“shivam”是神的纯真，“sundaram”是美感。中国民间流传的“世上好言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说明印度古文明的诉求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再回味一下泰戈尔1924年在中国讲演中的一段话：

“在中国你们并不是个人主义者。你们的社会本身是你们合群的灵魂的产物，不是物质主义和利己主义头脑的结晶——不是无限止竞争的混合而拒绝承认对别人的义务。……诚然你们对这个世界、对你们周围的物质的东西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从来不用独占的高墙把你们的财产围起来。你们和别人分享财富，你们热情招待远朋远亲。你们并不是富得不得了。这些都是因为你们不是物质主义者。”^①

泰戈尔这样深刻地了解中国的文化气质，是因为这种文化气质在印度也是很强烈的，也证明东方文明气质的共同性。

读了泰戈尔的这段话，不禁想起1938年4月10日尼赫鲁写给谭云山的信中的一段话：

“中国和印度在过去的许多世纪中对人生持有一定的理想。在今天的世界上，这些理想应该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有所适应。……我相信我们两国会在世界和平、自由的大业中共同合作，但无论是幸运还是倒霉的时候，我们谁也不会为了寻求暂时的好处而把自己的灵魂抛弃。”^②

这就帮助我们继续讨论如何把东方文明气质变成中印研究灵魂的问题。我认为有三方面：（1）把中印两大文明的传统发扬光大；（2）把中印关系当作特殊关系，当作国际关系中的重中之重；（3）中印两国站到前

① Das, Rabindranath Tagore's Talks in China, pp. 63-64.

② 参见谭中与耿引曾：《印度与中国》，第47页。

茅，联合全世界共同缔造“地缘文明范式”来取代“地缘政治范式”。

关于第一点，把中印两大文明的传统发扬光大，20世纪50年代已经开了好头（可惜没有继续）。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于2004年6月14日在北京庆祝“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宣布50周年的大会上讲演说，这“五项原则”是中国传统的“在人们行为中实现和谐”的原则在现代的发扬光大，是中印两国谈判西藏贸易问题时，中国代表团先提出而为印度代表团所接受的。尼赫鲁总理在印度国会欢迎这“五项原则”，举了佛教“五戒”（Panchsheel）为例，又说，他在印度尼西亚看到这“潘查希拉”（Panchsheel）被政府宣布为施政原则，他因此觉得这是个“吉祥的词”（happy phrase）。^① 纳拉亚南在1954年是印度政府外交官，他说的这一经过很有意思，是东方文明的气质变成现代中印关系良好发展精神的生动事例。

关于第二点，把中印关系当作特殊关系，当作国际关系中的重中之重，这是贯彻季羨林所说的中印比邻“天造地设”，超越了普通的地理规律。“中印研究”（Sino-Indian studies）这个概念是泰戈尔和谭云山在圣地尼克坦（和平乡）共同创造的。前面谈到泰戈尔的言论折射出“vasudhaiva kutumbakam/天下一家”的观念，泰戈尔更在自己的事业中试图把“天下一家”的观念付诸实施。1920年12月11日，泰戈尔在纽约写信给中国文学家许地山说：“让我们使地理障碍的幻景消失，至少在印度的一块土地上——让圣地尼克坦^②成为这块土地。”^③ 泰戈尔说：“圣地尼克坦应该没有地理界限的地方，这一感觉在我心中早就有了。”早在1916年他就写道：“在人和神的公路上，我们漫步，唱着超人的歌……我们把那个伟大世界的路上当作自己的国家。”^④

泰戈尔所办的国际大学名叫“Visva-Bharati”，根据是《吠陀经》的引语“yatra visvam bhavati ekanidam”（全世界在一个鸟巢中聚会）^⑤，

① 参见 CV Ranganathan（任嘉德）（ed），*Panchsheel and the Future: Perspective on India-China Relations*（2005，New Delhi: Samskriti &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p. xxii.

② “和平乡”（Santiniketan）是泰戈尔办学的地方。

③ Ghose, *Tagore for you*, p. 132.

④ 同上，Ghose 教授的注释。

⑤ Das Gupta, *Rabindranath Tagore*, p. 199.